
关于上海农业农村现代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方志权 张晨 楼建丽¹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200003)

【摘要】: 上海农业是典型的都市农业, 体量不大, 但资源环境约束大, 要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需求, 就必须在绿色化、品牌化、社会化上下功夫, 通过做特色、做精品,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建设要因地制宜, 突出地方特色, 不仅要有“颜值”、更要有“气质”。职业农民要完成身份职业化的转变, 朝着技能化、适度资本化、具有一定生产组织能力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都市农业 上海乡村 三农

【中图分类号】: F30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20)09-0075-009

上海作为我国的超大城市, “三农”工作有其独特重要性。“十四五”以及今后一个时期, 上海如何立足超大城市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使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各项战略决策, 不仅能够落地生根, 而且结出示范意义的果,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上海城乡功能定位演变历程及其规律

从世界城乡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 在农业社会, 城市与乡村孤立分散发展。在工业社会初中期, 城市与乡村总体对立发展, 在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方面呈竞争关系, 非农化城镇化占据主导, 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 总体趋势为“城进乡退”。在工业社会后期, 城市化进入成熟稳定阶段, 城市和乡村在土地利用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相互混合融合、密不可分, 形成互为依托和影响的共生发展关系。在后工业社会, 农村劳动力的流向发生改变, 出现“逆城市化”的趋势, 城市发展模式由规模扩张为主转为内涵提升为主, 城市与乡村形成关联紧密的发展共同体, 城乡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考虑。上海的城乡关系演变进程, 符合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规律。

1984年, 上海按照“城乡通开”的思路, 鼓励城市工业向郊区扩散产品, 发展工农联营企业。1986年, 上海从城乡一体化出发, 提出了郊区“一二三四”发展方针, 即: 城乡一体化, 两个立足点(郊区农民口粮立足自给、城市农副产品供应立足郊区), 三业(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建立四个基地(农副产品基地、工业扩散基地、科研中试基地、外贸出口基地)。1990年代中期, 上海又提出了“三个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 并提出“繁荣繁华看市区、实力水平看郊区”。

这一时期, 上海的城乡定位是服务与从属的关系, 郊区农村承担了城市腹地的空间载体功能, 农业发展呈现城郊农业特征, 突出发挥“米袋子”和“菜篮子”的作用, 旨在解决温饱问题, 单纯追求数量, 服务保障城市主副食品供应。从统计数据看, 当时各项涉农生产指标处在历史较高水平。

进入21世纪, 上海进一步提出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尤其是“十二五”以来, 强

¹**作者简介:** 方志权,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秘书处处长, 研究员。张晨,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秘书处人员。楼建丽,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秘书处人员。

调要把上海郊区放在现代化建设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城市建设重心向郊区转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先后制定出台了城乡一体化的指导意见、专项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城乡发展一体化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这一时期,上海的城乡定位发生明显变化,形成了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格局。伴随着中心城区的制造业和人口向郊区转移,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也更多向郊区配置。2000—2016年,上海耕地面积减少约140万亩,农业占GDP的比重由1.6%下降到0.4%,工业和服务业成为推动郊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同时,农业发展也由城郊型转变为都市型,更加突出高效和生态,园区化、工厂式的集约化种养模式开始形成,休闲农业成为市民假日出游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上海郊区粮食、畜禽的产量下降幅度较大,蔬菜、水果、鲜奶、水产品等供给城市的鲜活农产品产量提升明显。

2017年以来,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上海的城与乡关系定位进入新阶段,城与乡是一个整体,彼此是平等的主体。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城市核心的研发功能、科创功能不断转向郊区,郊区已成为超大城市不可替代的宝贵稀缺资源,是未来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农业不再以“产量论英雄”,而是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从产品型向服务型转变,以更好地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向往。

二、上海郊区乡村发展优劣势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阐述过两个客观规律,一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二是“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上海不管现代化进展到哪一步,郊区及乡村都将长期存在。如果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乡村就是让城市更向往。如何准确把握新时代上海乡村发展战略和农业农村功能定位,有必要对上海乡村发展的优势、机遇、挑战和问题进行SWOT分析。

(一)上海乡村发展的主要优势

上海的郊区农村紧靠市场需求,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先导性,资源禀赋较好,生产设施较为完善,资金、人才、科技等现代生产要素优势突出,是现代乡村产业和都市农业发展的高地。同时,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要素最为聚集、创新活力最强的城市,上海是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沃土”,是推动农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孵化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促使农村电商、农产品“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在超大城市探索出了可行经验,再复制推广到其他农村地区。上海现在不缺农产品,缺的是与市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相匹配的优质农产品供给。上海农业背靠长三角、坐拥大上海,广阔的市场和高端的需求是农业发展的巨大优势。因此,在上海要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下,重塑超大城市郊区农村的产业体系,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和都市农业,有利于促进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与农业农村的对接转化,从而催生更多的兴农新业态、富农新产业。

(二)上海乡村发展面临的机遇

超大城市乡村发展战略和功能定位,一定要跳出“三农”看“三农”,不能简单地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村谈农村,而是要善于从全局看局部、从未来看当下,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找准城市发展机遇,把“三农”工作置于城市整体发展的大格局中去思考,放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乃至更大空间里去谋划。

1. 郊区乡村是支撑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

从城市功能布局看,由于中心城区及其延伸部分总面积仅1000平方公里,各种功能布局、各类要素集聚已趋饱和,加上城市更新,中心城区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功能正在向郊区及乡村拓展迁移。比如,随着中心城区旧区改造力度的加大,人口大量转移至郊区,公共服务、产业配套也随之转移,郊区成为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主战场,成为市民居住生活就业的主空间。乡村和城市可以有空间布局上的差异,但不应该有生活品质上的差异。因此,要把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放在重要位置,加大投入

力度,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不断增强郊区的吸引力。从城市使命看,由于尚未开发的集建区主要集中在郊区,所以郊区越来越成为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成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布局,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比如,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连同进博会,这四大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支撑,其中三项都与郊区密切相关。进博会主场馆、长三角一体化直接带动的是西部郊区,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直接带动的是东部郊区,覆盖了乡村振兴主战场的大部分区域。可以说,郊区乡村是新时代上海再造传奇的关键载体。

2. 郊区乡村是上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据统计,加上 700 万流动人口,生活在上海的实有人口超过 3100 万。上海每天要消耗掉 7 万吨食物,其中 90%的绿叶菜、70%的鲜奶、20%的水产品来自郊区地产供应。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我们更加体会到确保一定比例的地产农产品生产、为超大城市提供鲜活农产品的重要性,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尽管农业比重不足 1%,但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米袋子、菜篮子适当保有的问题。同时,对上海来讲,广袤的郊区乡村不纯粹是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承载着重要的生态涵养、主副食品供应保障等功能,这对上海城市安全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包括林地和耕地在内,上海郊区乡村绿地面积超过 3000 平方公里,是整个城市的“绿肺”,是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支撑。

3. 郊区乡村是体现上海国际化大都市乡愁的主要载体

建设美丽乡村,一定要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宁静典雅、错落有致的郊区乡村,不仅是国际大都市的美丽“大花园”,更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容器”,容纳着人们满满的乡愁——一种家乡味道、一种故土情结、一种精神寄托、一种生活方式。我国农耕文明底蕴深厚,乡愁对国人更具有特殊意味。上海作为江南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不仅要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要有抬头仰望可见繁星的村落。实际上,向往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农家美食,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慢生活,已成为上海都市生活新时尚。

(三)上海乡村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上海城市与乡村二元结构中“三大三小”的特征较为显著。

特征一:大都市、小郊区。从区域面积来看,上海是具有 2400 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但郊区面积在全国所有直辖市中是最小的。这一特点可称之为“弱郊区社会”,易出现两个重要反差:其一,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城乡之间的绝对差距可能越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能力的反差可能更为凸显,从而出现明显的“景观滞后”。其二,特大城市郊区农民收入和乡村发展,不仅落后于城市,可能还滞后于周边其他地区。2019 年,上海郊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 万元,而嘉兴为 3.7 万元、苏州为 3.5 万元,宁波和杭州均为 3.6 万元。

特征二:大城市、小乡村。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上海乡村的经济体量在全市经济体量所占比重更小,“城”“乡”发展更难以实现平衡。这一特点可以称之为城乡失衡,城市对其周边区域具有虹吸效应,而上海比其他城市具有更大的虹吸效应,不仅仅是对其他地区要素的吸引,也包括对自身农村要素的吸引;不仅仅是对人才、资金的吸引,也包括对土地资源的吸引。

特征三:大经济、小农业。从三次产业角度看,上海第一产业比重非常低。2019 年,上海 GDP 总量 38155.32 亿元,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只有 103.88 亿元,仅占 GDP 的 0.27%,属于典型的“小”农业,这一比重虽高于东京、深圳的 0.1%,但未来上海的农业产值比重仍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结合资源要素的稀缺性,来自上海郊区基层的 3 个方面期待需要予以回应:一是如何盘活各类土地资源,包括未高效利用的承包地、未科学规划的集体建设用地、长期“沉睡”的闲置宅基地。二是如何塑造具有上海特色的乡村风景,既有看得见、摸得着

的有形之景,更要有凝聚乡村之“魂”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内核。三是如何更好生产满足超大城市市民消费需求的本地时令鲜活农产品,打响一批耳熟能详的地产优质农产品品牌,使之成为一张上海亮丽的名片。

(四)上海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

从总体看,上海乡村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明显的短板仍然在“三农”。主要表现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深度不够,农业供给质量效益和综合竞争力亟待提升;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新型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农民转移就业空间不断收窄,受农业成本上升和价格“天花板”挤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任务艰巨,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仍有差距,农村精英回乡少,城市资源下乡少,各类要素向乡村流动的渠道通而不畅;镇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乡村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集聚资源要素能力有限,城镇对乡村的承接疏导作用和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一些撤并镇集镇服务功能弱化,基础设施老化,更新改造缺乏有效投入;农村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一些村的集体经济较为薄弱,乡村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适应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对上述影响上海乡村发展面临的瓶颈和短板问题,必须未雨绸缪,统筹研究。

三、国内外大都市郊区乡村发展模式比较分析及启示

(一)国外经验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城乡均衡发展,保持乡村活力。日本的“造村运动”、韩国的“新村运动”、德国的“乡村更新”、法国的“农村改革”、美国的“乡村小城镇建设”等做法,都表现出共同的规律。总体而言,英国、荷兰、日本的郊区乡村和现代农业发展形成了较为成功的模式。

1. 英国、日本的乡村最大魅力在于生态宜居

伦敦、东京的郊区,本质上是生态宜居的城市居民社区,住在乡村的主要是有产阶级,属于中等收入以上阶层,真正的农民很少。大量的非农业人口居住在乡村,不仅优化了乡村人口结构,也提高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英国人把住在乡村、回归乡村作为人生一大追求,日本也出现新一轮回归乡村潮,乡村吸引力可见一斑。它们的共同经验:一是加强历史和风貌管控。英国对土地发展权进行深入界定和合理规范,按照规划和法律进行严格管理。日本则先后采取立法、体制、机制和政策工具,改善乡村配套服务,保护环境,解决好发展不均衡问题。二是注重完善乡村整体功能。英国、日本在乡村发展政策方面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包括实行农业经营专业化、推进城乡功能互补、增加乡村就业机会等。

2. 荷兰、日本农业的最大特征是优质高效

荷兰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 2%,农业增加值却占 GDP 的 4%,出口占总出口的 25%。全国农业劳均年产值 4 万多欧元,劳均出口 3.3 万美元,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均高于第二、第三产业。农业大批出口、大把赚钱和大量缴税,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日本的农产品品质优质佳,是精致农业的典范。据了解,日本都市农业仅占全国 2%的农地,却贡献了 8%的农业产值。农业的生产生态、抗灾防灾、文化传承、休闲体验等多元化功能在东京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们的共同经验:一是依托高科技支撑。日本十分重视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实行农业全自动化管理;利用手机 App 操控,实现农田灌排水自动化;水稻播种、收割等环节无人机械大面积广泛应用。荷兰大力发展种源农业,利用基因技术在蔬菜、园艺新品种育种方面已走在世界最前沿,如温室蔬菜彩椒单位产量高达 50 公斤/平方米,1 公斤番茄种子价格远远高于 1 公斤黄金。二是实现全产业链增效。始终贯彻大农业、大食品的理念,实行农林牧副渔结合,坚持农业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做到产学研一体,通过延伸产业链不断提升价值链。在荷兰绿港,从种子、育苗、生产到加工、贸易、物流、金融,农业关联产业高度集聚,形成了上下游紧密联系,一、二、三产业贯通的全产业链。同样,日本大力倡导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六次”产业发展,2017 年“六次”产业总额达 3.9 万亿日元(约

2500 亿人民币)。

3. 英、荷、日的农民都是高素质职业化

在英国、荷兰、日本,当农民是有门槛的,农民是很体面的职业,从事农业的人员都是高素质的职业农民。荷兰农民素质最高,只有取得农业大学毕业证书即绿色证书的人,才有资格可能成为农民,教授、博士并不见得稀罕。英国明确规定农民从业的学历门槛,实行“有证务农”,持有《专业资格证书》《农民师傅证书》的农民,才能经营管理农场及招收学徒。日本农业家庭经营实行长子(女)继承制,农业就业的最低门槛是大专毕业。同时,农民的来源面向全社会,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农外优秀人才到乡村当农民。

(二)国内经验

从国内看,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广为推崇的有“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两种。

1. 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指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地方政府推动型模式。从计划经济的合作社,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调整改制期,再到 21 世纪以来积极发展合作经济和股份经济、推进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苏南农村地区走出了一条资产租赁型、企业股份型、农业开发型、联合发展型等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南地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由乡镇和行政村直接投资办厂并直接经营管理,经营风险大,收益不确定,农民直接分享经济收益并不多。21 世纪以来,苏南农村加快制度创新,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清产核资、股权界定、股份量化,将集体经营性净资产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明确农村集体资产权属关系,形成了“新集体经济”。总体上看,苏南农村“新集体经济”发展的主渠道是资本经营、资产资源租赁和承包经营,经营风险小,收益持久稳定,并实行按股分红和福利分配相结合,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益状况与成员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

2. 浙江模式

浙江模式也被称为“温州模式”,是指以家庭经营和发展私营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以温州市为发端,在乡镇农村地区开启了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浙江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

总体上看,浙江模式有 3 个特点:一是民间创业为主,不依赖国有投资和外资,群众广泛参与、普遍受益。二是产业层次较低,以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纺织品、日用工业品为主,主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三是新兴产业区和民间专业市场的形成,与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商业技巧、手工业的工艺技术、社会资本网络密切相关,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成为本地的主导产业,引领区域经济发展。

3. 对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的比较

两者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从发动者看,苏南模式倾向于政府(社区)发动型,发展的是农村集体经济,浙江模式属私人发动型,发展的是民营产业经济。从制度变迁、体制转轨的路径依赖看,苏南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浙江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两者共同特点是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比较高,都形成了有特色、带动性强的镇域经济。目前,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已相互吸收彼此的长处优势,在实践中逐渐发生耦合,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4. 两地实践为上海农村集体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是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美丽乡村建设之中,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二是把生态资本变成富民资本,将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以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得益彰。三是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变革入手,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走融合发展之路。注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通过抓住资源、人和经济的关键环节,加强资源优化配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宜商则商,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四是高度重视以新型职业农民、适度经营规模、作业外包服务等主要内容的现代农业模式创新,逐步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为农民创造就业实现增收。五是立足自身特色和优势,引导农民加快拓展农业的旅游休闲等非生产功能,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等新兴业态,打造本地乡村产业亮点,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

(三) 上海实践

上海乡村经济与苏南模式相近,注重的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而产业经济发展缺乏特色,规模效应不强,没有形成有特色、带动性强的镇域经济。上海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可归结为两种模式:第一种为物业分红模式,其优势是借助靠近城区禀赋发展物业项目,使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稳定的租金收益;其缺陷是租金收益与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密切相关,产业的可持续性不强,且不能有效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还会催生食利阶层,滋生背靠大树好乘凉的“等靠要”思想。第二种为产业发展模式,其优势是在“农”字上做文章,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拓展,增加涉农地区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带动区域整体发展,既可解决农民就业,又可实现资产增值;其缺陷是起步阶段难,前期投入资金缺乏,容易出现发展层级低、科技含量不高的情况,且易于同质化。

苏浙地区发展乡村经济,更多是依靠产业而非物业。当前,上海集体经济的发展偏重于依赖物业分红模式。与苏浙两地相比,上海纯农地区事实上也有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自然景观和人文风俗,不应妄自菲薄,完全可以在发展物业分红型集体经济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农村基层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强化产业发展型集体经济的发展,使之更可持续。

因此,新形势下上海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做到“两个结合”:与新一轮农村综合帮扶相结合,通过建设一批长期稳定收益的帮扶“造血”项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与产业相结合,使集体经济发展从偏重物业分红向发展产业转型,形成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未来上海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激发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加快形成规模效应,重点聚焦4个领域:一是聚焦特色农业和创意农业,通过加强科技支撑、品牌培育和产销对接,挖掘内部潜力,生产市场接受度高、附加值高的绿色优质农产品。结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发挥新业态、新模式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鼓励农产品的生产者、经销者运用各类视频、直播App创新传播手段,发展线上销售和无接触配送,大力发展在线新经济。二是聚焦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优先在具备自然人文资源和周边有比较完备的旅游设施的“三边一岛”(迪士尼边、淀山湖边、黄浦江边和崇明生态岛)开展探索,通过科学布局和品牌打造发展乡村民宿。三是聚焦传统经典产业和文化产业,通过挖掘发扬海派特色餐饮、曲艺、民俗等元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地区知名度,实现经济发展。四是聚焦大康养产业,以健康生活需求为导向,在郊区探索形成“农业+康养+文旅+多业融合”的城乡一体化的健康产业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以健康需求为导向,形成五大产业体系,分别是康养农业产业体系、康养旅游产业体系、康养地产产业体系、康养体育产业体系和康养医疗产业体系。

四、上海乡村发展功能定位建议

谋划超大城市乡村的发展之路,要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面向、三个融合”的前提下,确定上海农业农村发展的功能定位和目标任务。

“一个中心”就是围绕率先实现高水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中心,坚定不移地推进“三园”(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工程建设,努力在全国“三农”发展和乡村振兴工作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两个面向”就是坚持面向全球,同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对标全球性城市郊区乡村发展的理念、路径和形态,紧密结合上海实际,积极探索符合规律和自身特点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坚持面向未来,同上海要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科技合作与竞争的特殊使命相适应,进一步发现、开发、显化超大城市郊区乡村作为稀缺资源的战略价值。

“三个融合”主要包括:功能的空间融合、产业的跨界融合和促进文明的深度融合。一要促进功能的空间融合,使未来的郊区乡村成为令人向往的胜地,宜农宜工、宜商宜旅、宜业宜居、宜文宜教。二要促进产业的跨界融合,大力推动城区人力资源、工商资本、科技、文化等要素向郊区乡村流动,大力推动农业生产工厂化智能化、农业全产业链贯通增效,大力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现代金融、社会服务、新型消费等产业向郊区乡村集聚,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房变客房,让劳作变体验,让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充分释放、相得益彰。三要促进文明的深度融合,推动农耕文明、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在乡村深度融合,建设充分体现中国特点、江南元素、海派文化的现代化村落,真正促进农村全面进步、农业全面升级、农民全面发展。

(一)乡村价值功能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功能价值需要重新认识和发现。乡村有其不可替代性,价值是多功能性的,体现在空间维度,具有生活、生产、生态“三生”空间功能;体现在时间维度,则具有传承文化、旅游休闲的功能。从城乡关系看,乡村价值主要体现为五大功能:

一是生活空间功能。人类主要生活在乡村。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还会产生逆城市化现象。近年来随着低碳、慢生活理念的传播以及人们对健康的追求,乡村的生活空间功能将不断激发,通过改变乡村生活方式来带动生产方式的转变。

二是生产空间功能。乡村为农业提供生产空间,为城市提供本地产的蔬菜、畜禽、果品及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都市乡村的农业为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些特殊时段,都市农业为城市安全发挥无以替代的作用。

三是生态涵养功能。乡村的生态系统以村落地域为空间载体,将村落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等机制,综合作用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建立起人与自然、都市与乡村高度统一和谐的生态环境,由此减轻“水泥的丛林”和“柏油的沙漠”给都市人带来的烦躁与不安,为市民制造氧气,为城市降温净气,成为城市重要的绿色屏障,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

四是文化传承功能。乡村是一座文化宝库,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乡土情怀。通过人们亲自体验农业农村活动能够加深对乡村中特有的风俗、文明的理解,使农业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从事农业农村活动可以直接对市民进行农技、农知、农情、农俗、农事教育,体验乡村风俗、了解乡村文化,促进城乡文化交流。

五是旅游休闲功能。在都市内保留一些乡村空间,开发农业旅游和乡村休闲产业,既为城市增添了绿色,改善了都市生态环境,又为市民提供了旅游休闲活动空间,增加了减轻工作及生活压力新渠道,达到舒畅身心、强健体魄的目的。

(二)乡村发展定位

一是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充分利用超大城市的独特优势,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增强上海乡村发展动力。

二是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加快农村各类改革试点,举措集中落实、率先突破和系统集成。

三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充分利用上海对外桥头堡作用,加大农业对外开放力度,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从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

四是绿色发展的示范区。打造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样板,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使之成为全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样板。

五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充分利用人才、科技等综合优势,加强种源农业和智慧农业研究,增强对全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带动力。

(三)乡村发展目标

未来上海乡村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到 2022 年,超大城市美丽乡村基本建成,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到 2035 年,接轨大东京都市圈乡村发展水平,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基本实现现代化,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相得益彰。

到 2050 年,实现更高水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深度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五、实现上海乡村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

未来上海乡村发展,都市农业要彰显品牌特色,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上海农业是典型的都市农业,体量不大,但资源环境约束大,要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需求,就必须在绿色化、品牌化、社会化上下功夫,通过做特色、做精品,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上海的农产品一定要走优质化发展道路,既要有好品质,也要有好颜值,还要有好故事,要有吃头、有看头、有讲头。乡村建设要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不能搞“一刀切”,城乡一体化不是一样化。上海的乡村建设要精彩,就不仅要有“颜值”,更要有“气质”,不仅要美在“形”上,更要美出“灵魂”、美出“性格”。职业农民要完成身份职业化的转变,朝着技能化、适度资本化、具有一定生产组织能力的方向发展。

(一)都市农业要彰显品牌特色,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在发展绿色农业、规模农业、品牌农业、科技农业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上海人才、科技等综合优势,加快智慧农业技术应用,聚焦种源、装备等领域研发作为产业来打造,将技术作为商品来推销。以提升农业的智能化水平为突破口,实施“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机器换人,即聚焦“3 个一”:“一粒米、一颗果、一套装备”,汇聚一批人才、配置全球资源、培育新兴产业,加快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推进农业领域生产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二步人工智能(换机器人),即利用 A(人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据)、G(5G 信息技术)五大高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落地应用,实现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从耕、种、管、收方面,逐步替代人力,辅助决策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

加快郊区农业现代化建设。一是建设无人农场。聚焦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采用大田机械化精准施肥技术,集中连片推广无人农场,全程机械化、智能化首先在水稻生产上予以实现,到 2025 年建成 30%~50%的无人化示范农场。二是建设植物工场。聚焦蔬菜生产,加大“机器换人”力度,打造推广蔬菜机械化生产基地,重点推进蔬菜、瓜果种植等农业智能装备技术创新应用,可利用高精度环境控制,逐步建成全智能的蔬菜工厂,种植到采收全程自动化实现全国领跑,确保城市 80%的绿叶菜需求由蔬菜工厂供应。三是打造快乐农庄。聚焦果园管理,实行机器人智能化采摘,无人机杀虫、施肥,数字化技术管理等模式,破解

果树的采摘人工费高、果园管理难度大等瓶颈问题。依托快乐农庄开展人工智能科普教育展演,集采摘活动、学习讲座于一体,让青少年通过现场实地智能采摘。

(二)把握上海农村的发展路径

上海农村发展路径,要坚持“底色、融合、活力、开放”八字方针。坚持“底色”,就是要全面提高乡村生态和环境品质,这是基底和基础。坚持“融合”,就是要实现城乡在人口、资源等各方面要素的无障碍双向流动,在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合理布局。坚持“活力”,就是乡村要有较好的产业支撑,合理的人口结构,内生的持续发展动力。坚持“开放”,就是要改变乡村相对封闭的倾向,对城市开放,更多更好地承担城市功能。

一是深化宅基地改革,扩大农村宅基地使用范围,探索拓展居住以外的其他功能;探索建立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市场,逐步形成稳定、规范的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体系。

二是扩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试点,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作价入股,形成乡村振兴可持续赋能新机制。

三是充分运用日趋成熟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在坚持确保农民财产权益的大前提下,采用参股入股、效益分红等模式,积极探索壮大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在近郊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要注重产业转型升级,吸引跨国企业投资打造总部经济;中远郊地区,则应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联营、租赁、入股等途径,健全联农带农有效激励机制。通过全产业链开发模式、区域整体开发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紧密合作的利益共赢模式,使未来上海乡村发展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三)未来农民向职业化发展

未来农民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上海要积极创造条件开展试点,率先建立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职业农民制度。同时,要制定鼓励政策,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吸引一大批高素质人员从事农业全产业链经营。

一要逐步转移减少农民数量,着力提高其非农就业能力,开发更多适合农民的大容量市场化就业项目,促进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

二要用更大的格局和气魄,为超大城市郊区乡村发展广纳贤才、广育英才。广纳贤才,就是要出台政策措施,着力抓好招才引智,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充分发挥高校各类人才的聪明才智,促进各路人才“上山下乡”投身乡村振兴。广育英才,就是要加快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加快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